第一章 导 言

军事学，在中国古代亦称兵学。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们对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并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对各时期的军事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军事学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其思想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其后历代都有丰富和发展。它所提倡的重道慎战、义兵必胜的战争观，富国强兵的国防思想,知彼知己、示形动敌、兵贵神速、灵活应变的战争指导思想,以治为胜、上下同欲、恩威并施、气艺并重的治军思想,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后勤思想，寓兵于民的兵役思想等，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现代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创立了军事辩证法、人民战争理论和人民军队理论，总结了一系列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充分揭示了军事领域里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斗争的特殊规律，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也具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军事学的产生及发展

中国军事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大体经历了古代军事学初步形成、丰富发展、系统完善，西方军事学的传入与古代军事学的改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样几个大的阶段。

一、上古至秦汉：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初步形成

一般认为，文明史意义上的战争，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但作为人类对战争和军队基本问题理性认识的军事学，却不是随着战争的问世而同步产生的。在战争产生后的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的军事思维仍普遍处于蒙昧状态，大量愚昧落后的非理性意识，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战争的胜败，勇士的生死，都被视作由冥冥之中的“天意”“神旨”所决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国家的兴起，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战争规模日渐扩大，金属兵器被普遍采用，军队结构日趋复杂，同时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思维能力的进步，使人们对战争和军事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理性阶段。军事学即由此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国早在黄帝与炎帝作战时，已经在有意识地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最后三战而得其志。而且“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军事谋略思想，甚至指挥用兵作战的“司马之法”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恐怕过于武断。但华夏先民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在商周时期由感性向理性概括的层面升华，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商代甲骨文材料中，我们可以看

到许多商与诸方国间追击、袭扰、用间的事例。周灭商之战“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特别是在周朝建立以后,设置了处理日常军事行政事务的武官,“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周礼·县师》),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周礼·司兵》),对军旅之事的零星记载显然已被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即司马之法)所代替。

周王朝采取的是“封建亲戚,以屏宗周”的政治统治方式,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宗族、姻亲关系,这就将你死我活的政治利害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一政治格局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西周古典礼乐文明,也不可避免地限制并扭曲了反映军事活动本质规律的军事学的正常发展,使其呈现出“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汉书·艺文志》)的鲜明特点。从保存着大量周朝司马法内容的今本《司马法》及《春秋》诸传中,不难发现“征伐以讨其不义”的战争宗旨“不加丧,不因凶”“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的军事行动原则,哀伤怜病,服而舍之的战争善后措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这些原则曾作为官方的军事学说普遍受到中原诸侯之国的遵奉。齐桓公时,管仲曾“作内政而寄军令”,对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进行改革,但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周朝司马法和古军礼,而是运用其法“变而为节制之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刘寅:《司马法直解》)。春秋中后期,西周礼乐文明渐成土崩瓦解之势,要求抛弃迂腐古军礼,废除陈旧的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人舅犯言“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子鱼也说“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上述言论皆立足于功利学说,对以仁礼思想为核心的周朝司马法的权威性和可行性提出挑战。

而在实战中，采取于礼不合的奇袭、设伏、截击以及连续追击等新式战法的更是大有人在。至此，周朝司马法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诸子论兵和兵学流派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原先社会地位较低的文士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凭藉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聚徒讲学，议论政治，游说诸侯，著书立说，在当时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军事领域，诸子百家也对战争性质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表明了各自的看法。法家拥护战争，重视耕战，提倡以战争手段实现统一；儒家倡导义战，反对杀人盈城盈野的兼并战争，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提倡严密城守，把战争区分为“诛”（诛无道）与“攻”（攻无罪）两类，认为前者是正义战争，后者是“兼恶天下之百姓”（《墨子·非攻下》）的非正义战争；道家认为兵凶战危，“兵者为不祥之器”，诅咒战争，但为了反对弱肉强食，也赞成哀兵必胜的道理。纵横家对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主张用战争“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战国策·秦一》），并在战国时期的战争舞台上，运用这一理论导演出一幕幕合纵连横的壮举。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盛兴发展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最重要贡献的还是兵家学派。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提出了重战慎战思想，看到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以朴素的语言谈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更重视建军治军、作战指导等问题的阐述，在继承商周以来军事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全新的军事理论体系，其标志便是《孙子兵法》的问世。①

《孙子兵法》是在批判以往军事学传统，特别是周朝司马法的基础上立论的。它驳斥了愚昧落后的远古时代所形成的占卜迷信思想，

①《孙子兵法》的作成时间，学术界意见不一致。本书认为，其主要思想当源于春秋末年兵学家孙武，经孙氏后学多次整理、加工、修改而成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

指出在军事决策和情报搜集方面“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孙子兵法·用间篇》),而要依靠人的努力。它摒弃了以仁义礼让为核心的周朝司马法,认为现在的战争不再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和古老的礼乐文明,而是为了诸侯国君自身的利益。在作战方法上,它基本上不赞成堂堂之阵、正正之兵,单靠勇力取胜的做法,而是提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在对待敌人的政策上,也冲破了西周以来所盛行的“服而舍人”的原则,提倡“因粮于敌”,“掠于饶野”,缴获敌人战车后要“杂而乘之”,靠敌人的装备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上述重要观念的突破为前提,以国家、君主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建设的出发点,以战争制胜为核心,《孙子兵法》围绕着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进行具体理论阐述,提出了重战慎战的思想;注重计谋的思想、全胜思想和进攻速胜思想,概括总结了奇正原则、主动原则、机动原则、特殊地形的利害判断原则以及火攻、用间等特殊战法。它还沿用了前人提出的饥饱、劳逸、先后、众寡、主客诸范畴,并将阴阳、奇正等其他领域的范畴予以改造和借用,还根据理论阐述的需要构建了分数、勇怯、治乱等大量的新范畴,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军事学范畴体系。它善于运用五行相胜、阴阳相克的朴素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定量分析方法、逻辑推演方法来阐明用兵之道,语义深刻,警句迭出,富于思想启迪性,对其后历朝历代军事学的发展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由《孙子兵法》所确立的军事学理论框架被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比如《六韬》关于军队组织编制、将领选拔和步骑配合作战的专论,《孙膑兵法》对城垒攻防的论述,《墨子》完善环城防御体系、防御与出击有机结合的城守思想,《管子》对国防费用和武器装备管理方面的研究,都弥补了《孙子兵法》在理论体系上的缺陷。《孙膑兵法》关于“道”的阐释,《六韬》、《管子》对全胜思想的解说,远比《孙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兵法》更为深刻和全面。战国晚期，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他人军事学理论精华,综合儒、道、法、墨等各派兵论的长处,表现出强烈的兼收并蓄倾向,像《六韬》、《尉缭子》皆有集前人理论观点之大成的特点。真正全面总结、归纳和整理先秦军事学成果，还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汉朝建立之后。汉代曾三次由官府出面搜集、整理兵书,历次整理兵书的负责人张良、韩信、杨仆、任宏皆为深通兵法的最佳人选。许多先秦兵学著述的篇目分合、文字润色、理论补充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汉代四百年间，留下来的兵书只有《黄石公三略》等寥寥几部,以及《淮南子》、《盐铁论》、《潜夫论》等典籍中的个别论兵篇章，但其在整理、总结先秦军事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则是无可置疑的。

二、三国至宋元：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丰富发展

三国至隋唐的数百年间，兵学家们对《孙子兵法》所确立的中国古代军事学体系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补充。

他们面临新的更为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根据实践经验，对现实战略与长远战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以及联盟战略、统一战略的基本原则，都有了更加深刻、系统的认识。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的战略分析名篇《隆中对》，全面分析了当时多集团、多极斗争的形势，本着伐谋伐交，强己弱敌的联盟战略原则，提出了建立根基，外结盟国，内修政理，伺机而进的建策。五代十国时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统一全国，也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主张“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故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东都事略》卷二三)。这期间,还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门讨论战争全局性、谋略性问题的专著——《战略》(晋初

司马彪著），集纳先代战争事例及用兵方略，以便为统兵将帅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①。但在理论总结上建树最大的却是与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有关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卫公兵法》。前者在继承《孙子兵法》军事学观点的同时，更深刻地指明军事艺术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后者对中国古代军事学较少涉及的战略防御和持久问题作了阐释，认为当敌将多谋，部众齐一，兵利甲坚，实力雄厚而又气势锐猛时，“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通典》卷一五四引《卫公兵法》）。这种“战略持久”“后发制人”理论对《孙子兵法》所确立的“兵贵神速”“先机制敌”原则无疑是极为有益的补充。

他们根据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研究了如何提高将帅素质，陶冶其品德情操的问题，提出将帅不能有勇无谋，“择将者不务求其策反而先索其勇”，是“弃其本而要其末”（《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三国桓范语），因此主张将帅应急读兵书、史书，以借鉴宝贵的历史经验，即使是在戎马倥偬之际也要手不释卷。在选将标准上，既强调选拔智勇兼备的“通才”担任统帅，也要注重选拔有某种专长的“偏才”担任将领，特别要注意全面考察，先察后任，“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帝范·审官篇》）。宋以前，甚至出现了一部伪托诸葛亮之名撰述的兵书《将苑》，其中专门阐述将帅们以身殉国、忠贞不渝的节操，要求他们具有总文武，操刚柔，先仁义，后智勇，善知形势、进退、虚实、险阻的基本素质。其探讨的内容相当丰富，思想认识也是比较深刻的。

这一时期军事学的较大发展还是在宋代。

首先是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及秦汉时代的兵书只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

① 北周末年还有一部同名著作，金城郡公赵煚著，二十六卷，惜已失传，内容不详。

卷,图四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三百四十七部一千九百五十六卷。其中有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的《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武经总要》等书,也有从新的角度,在新的领域里探讨军事学原理的兵书,如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专门论述军事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何博士备论》、《百将传》,专门记述行军制度的《行军须知》等,皆言前人所未言,进一步填补了理论空白,完善了军事学体系。

其次,军事学成为官学。中国古代军事学发展源远流长,但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千余年间,它并没有像儒学一样取得正统官学的地位。《孙子兵法》等兵书只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才受到人们的重视,军事学理论的传播也以民间性的师徒相授为主,许多朝代甚至将其视为非法而明令禁止,违者处以重刑。宋仁宗时,因西北边患严重,战将统帅皆不知兵,下诏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供将帅们阅读,同时建立武学,培养懂得兵法的人才。宋神宗继位后,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武学教授,教习诸家兵法,纂次历代用兵得失成败。他还与王安石等人讨论李靖的阵法、队法及军事思想渊源,下诏命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供武学教育使用,统称《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的颁行,客观上奠定了军事学的正统地位。以往儒家学者曾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千方百计否定军事学中的‘诡道’‘兵以利动’等原则,贬黜孙子其人其书,现在则无法再对其持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而且《武经七书》中既收了儒家色彩浓厚的《司马法》、《吴子》,也收了黄老道家著作《黄石公三略》,法家特征突出的《尉缭子》,说明编选者是抱着兼收并蓄、诸家融合的学术态度,并不以哪一个人、哪一派的思想为归依。

其三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大为增加。先秦时代的兵书,除

《墨子》“ 备城门 ”以下诸篇外,大都对军事技术问题语焉不详。这与中国古代“ 重道轻器 ” 的历史传统是相吻合的。宋代军事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倾向。比如《武经总要》前集的第十到第十三卷中，就以较大篇幅介绍当时的兵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守器械，记载了中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记叙了含有运筹思想萌芽的军粮运输之法，解释了地听可以监听远处军事行动的原理以及制作立体地图(类似于今天的沙盘)的方法等。陈规的《守城录》一书,不仅对城防体制改革和城防设施的变化多所建策，还介绍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竿火枪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宋代战术之所以出现较大变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军事技术通过兵书、文集得以广泛传播和普遍应用。

最后是军事学内容更加通俗易懂，传播范围更广。宋人在整理校订古兵书时，注意将其中冷僻不顺的字句改得更加准确易懂，文意更加顺畅。将反映汉代面貌的竹简本《孙子兵法》与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武经注本《孙子兵法》相比,不难发现这个特点。而且宋人十分重视汇集历代兵书注释的成果，自己也花了很大力气纠谬补遗，串讲发明，颇便于后人理解。随着武学、武举在宋代兴盛起来，以标题讲章的形式普及军事学知识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一些人因编写普及型的军事学教科书而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如著有《施氏七书讲义》的施子美，“ 为儒者流，谈兵家事，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 ”(《施氏七书讲义序》) 。即使是新著兵书，也首先考虑到粗通文义的将帅军校易读易记。如《百战奇法》一书，将古代治军用兵原则高度浓缩起来,归纳成‘ 计战 ’、‘ 谋战 ’等一百条,每条以史证理，以理释史，提纲挈领，以简驭繁，颇为明清兵家所仿效。上述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军事学神秘不为常人知晓的面貌，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三、明清（前期）：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系统完善

明清(前期)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发展。在军事上，高度中央集权的统兵制度日趋巩固；火器大量装备部队，并运用于实战，使作战样式更加复杂多样；随着武学和武举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 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明茅元仪编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郑若曾编海防理论著作《筹海图编》、顾祖禹编军事地理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戚继光著治兵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清王余佑著战略著作《乾坤大略》、朱墉著兵书注释性著作《武经七书汇解》等问世,或填补理论空白,或丰富前人学说,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明清（前期）军事学发展的成就反映在建军治军思想、边海防思想和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作战指导原则等领域。

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视卒如爱子”等治军名句，其后历朝历代论述建军治兵者也颇多。但真正形成一套完整的建军治军学说，并赋予其现实操作性还是在明代。明代军事家戚继光面对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卫所制度崩溃，招募来的士兵不堪任战的情形，在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中认真总结自己的治军经验,写下了著名的《纪效新书》。书中提出,募兵尤贵选。要选乡野老实之人,不用市井油滑之徒,注重胆气精神,而不在武艺高超与否。在火器运用日益广泛，但又不能完全取代冷兵器的情况下，武器配备要长短相杂,刺卫结合。在军事训练上,既要进行技能训练,练习耳目手足,也要进行思想训练,练心,练胆,并以后者为重点。其内容以儒家思想为宗,提倡忠义之理,使士卒具有亲上死长,卫国保民,视敌如仇，视死如归之心。在军中赏罚问题上，除了重申赏罚不论贵贱恩仇

的基本原则外，更进一步提出赏罚不仅应施于战时，尤须行于平日。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了德、才、识、艺兼备的要求,指出将帅要谙韬略、习武艺,有广博学识,还要诚实任事,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要同甘共苦。同时还呼吁对将帅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遥制,不分权,不信谗,使他们尽力展布才能。明末问世的《金汤借箸》等兵书在继承戚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忠爱、敢战、守法、勤习、敦睦、信义六条训兵原则。清代，上述思想观点曾普遍被人们所遵奉。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大臣将帅在奏章文告里广泛征引六条训兵原则，强调练兵练胆的重要性。曾国藩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借鉴戚继光所确立的某些建军治军原则组建湘军，强调以“忠义血性”的儒生统领“朴实少心窍”的山农，由统领至兵勇皆逐级自选，层层节制，在军队管理上贯彻宽严相济的方针，对士兵要精练勤训。他的这套理论渗透着浓厚的儒学色彩，又为晚清以后“兵为将有”现象提供了依据，因此颇受后人重视。

在边防问题上，明王朝从自身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点和“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明太祖宝训》卷六）的历史认识出发，基本上不主张主动出兵，而实行在边疆严加戒备，来则御之，去则不追，战、守、和迭相为用的策略，并耗费巨资修复和增建历朝历代所据守的长城防线，屯以重兵。清王朝改变了明朝重长城守内边的方针，批评那种视边疆地区和民族“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怀，地不可耕，民不可臣”(《普宁寺碑》)的谬论，而主张凡是中国版图内的土地和人民，都必须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的管辖之下。为此，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镇以重臣，屯以劲旅”(《黑龙江外纪》卷一),筑城驻兵，巡阅边界。

在海防问题上，明王朝根据倭寇肆虐沿海，烧杀掳掠的事实，主张大力发展水军,建设海岛、海岸、城邑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御敌于海洋,御敌于海岸,御敌于内河,御敌于城邑,尤以御敌于海洋为上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敌‘来则攻之,去则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正气堂集·请多调战船》)明后期和清前期，人们对海防问题的认识有所倒退，水军建设也有所萎缩。清朝廷在少数几个海口设立的水师，主要任务只是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但仍有人提出一些可贵的见解。如康熙帝晚年从西方各国战舰、商船在中国沿海横行的事实中，察觉到其从海上入侵的危险性,指出‘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而‘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

中国自宋金时期发明火器以来，至明代中后期火器才在作战训练中大量使用，并引起作战样式的变化。进攻时强调火器配置要短长相济,步兵冲锋应当鸟枪、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则要三眼铳、火炮交替使用,以保证火力的发扬。攻城除传统的战法外,更主张以大炮轰击，或穴地以火药炸开城垣。防守时注意将坚固的城防工事与火器威力相结合,构筑城壕、牛马墙、城墙等多层工事,使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建设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凭坚城用大炮消灭进攻之敌，并不时辅以奇袭等攻击手段。明军还首创了装备火器的战车,行则为阵,止则为营,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又可与步、骑协同作战，成为野战中最具有威力的攻防兼备的兵器。

四、近代：西方军事学的传入与中国古代军事学的改造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辉煌成就,令国人陶醉,也令国人自傲。然而它毕竟只是适应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军事理论。十七至十八世纪，随着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兴起，工业革命的出现，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适应近代火器作战的新的军事学说也应运而生。清政府由于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欧洲各国的巨大变化一无所知,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人才惊讶地发现“天下”之

外竟还存在着一个罕为人知的广阔世界。魏源《海国图志》一书描绘了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历史地理、民族风情和西方科学技术现状，更使少数有识之士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军事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提出了变革传统军事学的要求。可惜这些真知灼见在当时的社会里很难得到蔑视夷狄的封建士大夫们的认同。他们对迅速发展的西方军事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连1845年俄国政府送给清廷一批军事理论图书也要严密封存起来，免得国人受到蛊惑。至于如何抵御外来侵略，他们却无良策。

晚清湘军实行“兵归将有”的统兵制度，利用地域宗族纽带来密切官兵关系，严格的训练也使士兵身体素质、个人技能和战术意识有所加强，战斗力大大超过经制兵八旗和绿营。湘军的统兵制度虽属古老，但在募兵选将、部队编制、军事训练和作战战术等广泛领域另起炉灶，客观上为军事学的变革开通了道路。真正对中国古代军事学进行冲击的，还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李鸿章在上海“华洋会剿”时，已对洋枪洋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担负起直隶地区防务后，面对列强环伺的严峻局势，深刻认识到：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蛮夷之邦”轮船之速日行千里，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是中国千古未遇的强敌。感到只有认真学习西方军事学，才可以“攘夷以自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陆续翻译了相当一批西方军事学著作，其中一些被近代督抚言官视为洋务用兵的必读书，言论被引用，观点被采纳。中国古代军事学在国防政策、战略、战术等各个层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七十年代的海防大讨论，改变了以往“重陆轻海”的传统，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战略格局；中法战争前后对援越问题的争论，破除了数千年的“宗藩”观念，代之以新的“藩篱”政策。此时，虽然富于东方兵家智慧的谋略思想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中

国古代军事学由于从整体上不适用于近代战争，其趋向解体已不可避免。

中国古代军事学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它的每一点进步都要遇到重重阻碍。当狭隘的“夷夏之防”观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壁后，一些顽冥不化之士又千方百计利用“体用”之说，将学习西方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在他们看来，坚船利炮属于“器用”一类，学之固无不可；战法制度则事关国体，不可求诸他人。所以即使在战争中证明已不适用的古代阵法，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鸿章在上海时，曾“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结果遭到多数部下的抵制。淮军 1868 年刊行的《洋枪队大操图说》和 1871 年刊行的《枪炮操练图说》，在采纳西方战术的同时，仍生硬地将其附会在传统阵法上，衍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阵式来。就连思想颇为开通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八十年代仍强调说：“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自有干城腹心，岂能学步他人，别求新法？”故而对洋操阵式“断宜弃之不学”（《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一一）。

甲午战争前后，许多清醒的爱国志士不能再容忍古代军事学的缓慢解体和军事改革的曲折进程，开始对《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进行深刻反思，重新估价它们的时代价值。郑观应指出：“夫兵无强弱，而时则异古今；众无多寡，而势则分中外。今之战事非廿一史之战事所有也，今之战术非孙吴兵书中战术可尽也。”① 陈龙昌也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谈兵家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良以数十年来，西国枪炮盛行战阵之间，旧日成法

①《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八，《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846 页。

已难胶执，诚兵事变幻之一大关键也。”(《中西兵略指掌》卷二〇)徐建寅著《兵学新书》,更是广泛搜罗西方兵役、编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方面资料，打算建立起一个与传统军事学完全两样的新的军事学体系。特别是 1894 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仿西法改革军制，创练新军的必要性。其言论以张之洞等人上奏朝廷的“江楚变法三折”最具有代表性。它激烈抨击了甲午战争以前受‘体用’思想束缚,军事改革仅及皮毛的错误做法,主张将西方军制、战法皆纳入“用”的范围之中,所提出的采用新的编制体制,改革旧的兵役制度，更新粮饷章程，改善官兵经济状况等主张，实际上为西方军事学说较全面传入中国廓清了道路。此后，新军采纳了新的编制体制,摒弃湘淮军‘稳扎硬打’”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法,转而提倡灵活机动,发扬火力,强调步骑炮兵协同配合的战术。同时,仿西人致富之本，大力发展工商业，以为国防建设基础的思想；建立完善的军事教育体制的思想；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思想；提倡军国民主义，宏扬民族尚武精神的思想；与列强争取海权的思想等，开始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中国军事学从此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旧军事学体系的解体固然艰难，新军事学体系的建设更为不易。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清朝统治者决不会放弃那些属于“道”和“体”的实质性内容，如中国古代军事学中专制君主对军队的统率权、军队的服务宗旨、军人的忠孝意识等。袁世凯所提出的“道必师古,法必因时”① 的训兵原则，便代表了统治阶级对军事改革的基本态度。清末，随着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袁世凯等人更是宣扬军人的忠孝意识，只不过令官兵忠诚、孝顺的对象已由封建皇帝偷换成他们自己而已。另一方面，一些人在介绍西方和日本兵学时，也表现出强烈的照搬照套倾向。沈敦和纂辑《自强军西法类编》时,力求一字一句

①《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训练总说》,清光绪二十五年新建陆军印藏本。

务与西书吻合 陈凤翔编写《战法学》,不仅章节层次悉仿日军教程,连其中所谓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战争能致富强等错误说法也照抄不误。

辛亥革命后,封建统治的思想桎梏被打破,军事理论家们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来吸收西方军事学成果。这一时期,军事理论家们十分重视不带偏见地汲取中外军事思想精华,根据中国国情加以融会贯通。例如蔡锷编纂、1917 年刊行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指出,不能把日俄战争后西方盛行的“极端地主张攻击”战法搬入中国。因为中国兵力单薄,交通不便,军资器械更不如他人,不具备战略进攻的条件,主张‘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曾胡治兵语录·战守》)。蒋百里在提出国防建设应当贯彻“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时,也明确指出这是从成吉思汗军队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而他参照西方动员国民经济为国防服务的思想进行改造,使之更符合中国国防斗争的实际需要。

当然,由于中西军事学融合的方法迟迟得不到解决,知识准备也比较贫乏,时间过于仓促,更重要的是肯从中西军事结合的层次上讨论中国军事学发展方向的人太少,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西军事学的融会贯通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毛泽东等人从客观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创立了全新军事学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它来源于中国革

命战争的长期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优秀遗产，吸收了西方军事学的合理成分，将中国军事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人民战争学说、人民军队学说、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学说等几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的原理，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和胜利之本。总结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只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准备干部、发展生产和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并向全国作波浪式的推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人民战争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也要把其他斗争形式与之直接、间接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多地扩大自己的同盟军，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

人民军队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要想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建设成合格的新型人民军队，就必须将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其唯一宗旨。在军队中还要实行各级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建立有领导的民主制度，保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这支军队还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不断用新的武器装备自己，同时进行严格的训练，增强自身的作战能力,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以便最有效地发挥全体人民的伟大潜力。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主要特征是机动灵活，要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防御作战时要实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